

04

山西文史资料

3 / '96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1996年第3辑

(总第105辑)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 丁天顺
责任编辑 赵政民



ISSN 1004-5910



10>

9 771004 591009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05 辑

1996 年 5 月出版

出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芮城彩印厂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3117,3115

刊号:ISSN1004—5910

邮编:030074

CN14—1023/K 定价:6.00 元

EASS/53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姚奠中

主任 李裕民

副主任 乔志强 贾鸿鸣 郭全盛 聂嘉恩

赵政民 李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王艾权 兰安乐 刘存善

刘琦 刘纬毅 孙凤翔 华而实

宋富盛 杨小池 杨玉印 吴体刚

罗继长 张国祥 范仁贵 贺德宏

赵岩平 高恩广 陶正刚 常士晔

谢洪涛 谢克昌 董维民 霍军

主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张爱国

编委 王书福 周志清

○

目 录

共和 国 脚 步

-
- 特赦国民党反革命犯回忆 康耀先 (1)
-

峰 峦 岁 月

-
- 八路军驻三战区办事处活动一瞥 刘 展 (7)
-

参 政 文 草

-
- 要重视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考察组 (14)
- 关于要重视尧文化群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建议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
- 关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战旧址克难城的建议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6)
- 关于开发炎帝文化区的建议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9)
-

长 卷 连 载

阎锡山的 50 余次作战 董岩 征敏 (40)

政坛风云

我所知道的陈诚父子 周士豪 (120)

人物述林

彭德怀元帅在山西 谷峰 (123)

八路军北上的先行官 王书福 (140)

维新志士杨深秀 梁锦秀 (158)

宗教万象

抗日战争中的辽县友爱会及其医院 王之翰 (161)

勿忘篇

日伪时期寿阳县种毒吸毒简况 付光元 (169)

日军“毒化政策”在山西 陈翼 吕楚珩等 (175)

史海钩沉

山西抗击樊钟秀入扰始末 刘存善 (178)

口碑资料

冯玉祥将军在新绛 新欣文 (183)

特赦国民党反革命犯回忆

康耀先

“1975年，据说按周恩来总理提议，毛主席决定，特赦全国被扣押监狱的国民党反革命犯和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被管制的原反革命人员。这一年先是释放台湾空投大陆的武装特务，次放战犯（1959年特赦过一批），年末赦放县团级以上罪犯和原县团级反革命就业人员；1976年，又特赦区营级以下所有在押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山西地处内陆，公安部门为了劳动改造犯人，新建设许多煤矿、农场和工厂，集中沿海地区及大城市的一些反革命犯进行劳改教育。我在晋普山煤矿就业被管制中，同工人级别工资，有探亲假，唯独没有公民权利。1975年12月上旬，矿领导把就业的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的兵工处少将处长李智先，十总队少将司令荆谊，太原电业局局长张联五和县团级十几人，以及在押犯人原长治医院副院长孙东元（日本医科大学毕业，因有反革命问题被扣判刑），原北平起义的一个师长（忘名，因逃出国境被扣）及县团级十几人，共约30多人召集起来，宣布特赦令，并设宴欢送。之后我们乘坐两辆大客车回到太原，就业的送到西峪煤矿茬沟，原犯人送到上庄石渣厂。各劳改单位集中到茬沟和上庄各约800多人，由省公安厅主持学习一个月，每人发给单制服一套，棉花绒

毯一条，零花钱 100 元。吃的是白面大米，每周末看电影。学习完之日，酒宴欢送各回家。大家都是意外地高兴，非常感激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其中有死缓和无期徒刑的人，想不到得到特赦自由了。

学习方面，公安厅首长来住地讲了一次话，说：“这一次全国特赦原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是因为你们经过长短期不同的劳动改造和党的教育，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特别是经过劳动锻炼，成为自食其力的新新人，所以党和人民政府宽释特赦你们，都给予公民权利。回家后由当地政府重新安排工作，希望大家好好为人民服务。”接着我们小组会每天讨论。在会上有的人发言，痛哭流涕感激共产党的改造教育和宽大特赦，能与家人团聚，享受家庭美满幸福的生活，更悔恨前半生误入歧途，犯错犯罪。有的人发言陈述新旧社会对比的种种事实，在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强盛起来了，正在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再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人人发言，都是坚决拥护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表示要跟着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后半月开始参观学习，由公安厅干部率领，先去大寨，住在昔阳县招待所。偌大的饭厅有一百数十张圆桌，我们 1600 多人一次都开完了饭。我们乘坐大客车到大寨，初进村的路上，看见大寨人在冬天雪地的野外平整土地。进大寨村看见农民居住向阳的山坡，层层整齐的砖石窑洞排房，好象高楼，坡下有公共牛棚、羊圈、猪场、粮仓、磨坊、农具房和小学校等，四周山上层层梯田，条条山沟都垫土平整，变为海绵田（能吸水），最高的山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长的渠道，引来河水蓄于水池，浇灌梯田。时值冬季，树木林立于上山道路、梯田边沿及村围。并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时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全国各地的参观团，纷纷来大寨参观、学习，络绎不绝。大寨专有一个引导参观团的

讲解员，讲解各个地段变化的经过。参观的人无不称赞大寨人，在共产党村书记陈永贵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改造七沟八梁十面坡的顽强精神。这时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委员。我们参观完大寨田地后，到该村的大礼堂聆听现任女书记的报告，又在县城参观了陈列有陈永贵使用过的劳动工具和支援八路军抗战送粮的扁担、口袋等物的陈列馆。

我们返回太原，又参观了太原重型机器厂，这是我国自行建设的一座大型重工业企业。高大连接的车间，大型的机器，制造大型的生产机器，为旧中国所没有的。又参观移到南郊的山西大学，宽阔的校园，林立的楼房。有许多实验仪器和大型图书馆，比之旧山大在侯家巷的简陋建筑设备真有天壤之别，该校已成为现代化的学府。接着，我们参观了北营的针织厂，新建的厂房，崭新的机器，产品花样繁多。该厂是在南肖墙晋生纺织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为半手工半机器操作，现在变成了完全机械化操作的现代化企业，真是今非昔比了。我们在去各单位参观的沿途，看到新建设的工厂林立，地垅渠边没有荒地，感到新中国的变化很大很快，真是欣欣向荣。我们走马观花地参观完上述四个单位后，又开始几天的小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只顾打内战，根本没有工业农业建设，国家没有经济计划，更无社会公益福利。而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却完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参观学习后，于1976年1月上旬，公安厅发给我们每个人写有公民权的特赦证，按距家乡的路程发给路费。回到家乡，到市县人民政府报到再分配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早有文件通知各省市党政机关，要求接收安置我们这些人工作。除京、津、沪三大城市没有政治影响者不能回去和无家可归的仍留在原劳改单位重新分配工作外，绝大多数各回各省市县。回到太原市的有130多人。在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听公安机关党内人士说，毛主席、周

总理已经决定，将特赦的台湾武装特务送回台湾，而兵团司令级的战犯，可在中央当全国政协委员，军长级的当省政协委员，师旅长级的当一般市政协委员，县团级的当区县级政协委员，科长级以上人员则享受干部待遇。

回到太原，到市政府报到后，我们都被分配到市属企业工厂及服务业澡堂、饭馆、商店，一律当工人。原犯人按一至三级工待遇，原就业人不低于在劳改单位的工资级别。因这些人都年老了，能上班的上班，不能上班的在家休息，原工资养到老，不办退休。但我们都上班了，且到七十岁还要上班。分派工作时，区别对待，原被俘虏的分派在集体所有制小型企业，原起义、投诚立功者分派在国营中型企业工厂，都是1个单位1个。我是被俘的，分派在市手管局下属集体制的太原汽车弹簧钢板厂（后归属市机械工业局）。为什么没按毛主席、周总理的决定分派干部呢？据说这时毛主席、周总理病势沉重，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被“四人帮”赶下台，正被批斗“资产阶级翻案风”，张春桥掌权国务院。张说：“我们这些人放了他们够高兴的了，还当什么干部。”回到太原市的人，只有原阎军师长周建祉、原中央军团政治主任王澄清两人，不知什么关系，当了市政协的下级干部，其他人到各单位都当了工人。回到本省其它市县的人也是工人。有原阎军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回到洪洞县，家住农村，因年老在家闲居；七十师师长郑汶河回家后同亲人们吃饭欢聚，因兴奋过度，酒宴上激动得脑溢血跌倒死了。以后听说回到南方省市县的，多数当了政协委员和企事业单位干部。

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最年轻的也有五十七八岁。回到太原市的人，各单位起初都不愿要，把这些既没技术又是反革命出身的老头子纷纷顶回局里。再请示市政府，首长说：“这是政治任务的指令性安置，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样，各单位才把人接收下来。不幸，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同年逝

世。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未粉碎前的1976年上半年，我到厂当工人后，看到“批判资产阶级翻案风”的大字报，看到街上工人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手执纸旗，高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在省委省政府门前，停着数辆大卡车，红卫兵站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喊叫，好似锣鼓一样。

分派到各单位当工人的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上下班不迟到早退，不分份内份外的工作主动去干。如看到当时的环境脏乱，就自动打扫，对浪费原材料、生产不重视质量、工人迟到早退和旷工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现象，也提出具体改进办法，从而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大地。我们这些初分到各单位不愿要的人，经过两三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表现，成为各单位党的领导干部倚重的人物，多数变成了以工代干。如分派在太原刀剪厂的祝秉钧（原是阎锡山身边军官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因建议制做不锈钢餐具用具出口产品，使该厂扭亏为盈，被提升为厂长办公室主任，并联系出口业务，不久，又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太原制镜厂的吴鼎铭，因会写材料，也被提升为厂长办公室主任；塑料四厂的王春圃，因善于会计业务，被提升为厂部财务会计；林香斋柴市巷北口饭馆的刘子伟，因干活勤快，关心营业，由跑堂端盘抹桌提升为该饭馆的主任，使该饭馆由原来年年赔钱变成年年盈利，是林香斋分支四处饭馆唯一盈利的单位。回到吉县的王遂生，分派在该县沙平小煤矿，因在晋普山劳改煤矿学得坑下通风检查瓦斯技术，到沙平矿先当通风工，后提升为矿上唯一的技工，设计开巷道采煤工作，使该矿成为模范先进企业。再如孙东元平反后，由柳巷小医院三级工大夫升为山西中医学院副校长兼教授，并到日本交流医学论文；太原印刷厂送货工麻克宽平反后，升为市民革组织处长；回到五姓湖农场的三级工人周亚文，平反后因原是阎锡山的中将兵站分监，

被选为太原市政协委员。我本人在汽车弹簧钢板厂，三中全会后，由汽车装卸工，提升为厂部原材料保管员，后又兼任下料工段长。因制定领用材料制度和精制产品质量、不出废品、不浪费原材料的奖惩制度及办法，大大节约了优质钢材，又利用十年“文革”期间积存如山的废品改制成产品，连续两年共节约成本二万八千多元，并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使本厂连续四年被上级评为全市的先进企业，我被评为市机械局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局所属企业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表彰大会，并由《中国机械报》登出我的这点事迹。又由市机械局党委推荐，我出席了市政协在并州饭店召开的统战对象先进工作者的经验交流大会，出席了市委工业部召开的全市工业统战对象的先进工作者座谈会。1986年，市机械局张国和局长把我调到局里撰写全市机械工业志，从此我坐办公室不劳动了。当时我已70岁，党委书记、局长等共产党干部，对我都很客气，称我“康老”，不叫名字。我和他们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以后机械局党委撤销，我厂归南城区党委领导。从1990年以后，区政协每年一次大会必邀请我列席参加。我感到共产党真是宽大为怀，把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视为同志加朋友。

总之，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人员，自特赦以来都愿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我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应该和大陆共产党共商国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尽快统一祖国。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1996年1月20日

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活动一瞥

刘 展

抗日战争的1940年夏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迁移至山西省吉县黄河边的克难坡。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亦随部迁移在距克难坡不远的小圪塔村。

自1939年“晋西事变”后，我被囚禁在距办事处不远的窑洞里，每天放风晒太阳时，就能看见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小小的办事处，仅有十余人，却和二战区宪兵司令部数百人的庞大武装特务机关居住在一村。在公开形式上是宪兵部队保卫办事处的安全，实质上是要宪兵司令部严密监视办事处的工作活动，妄图截断办事处与外界的联系，把办事处完全孤立起来。

旧社会的宪兵是军中的“法兵”，权力很大。第二战区的宪兵部队更是阎锡山在山西培植了数十年的武装到牙齿的特务机关。它的任务是直接承担阎锡山的指派，执行一切特殊任务：如侦察、监视各级军政高级干部等。宪兵的官兵们都配备各种精良的进口手枪、冲锋枪等。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备电台以及其它特种器械。每个宪兵的文化水平都达到中、小学文化程度，并经过宪兵学校跟踪、盯梢、拳击、捕拿等各种技术训练，自称是阎长

官的“千里眼”、“顺风耳”。可将各种谍报材料，直接送交阎锡山亲阅。

当时的宪兵司令少将李润法，崞县（今原平）人，多年效忠阎锡山。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派李润法及随员常驻沈阳市，执行窥视张学良动态、邀请张学良出兵山海关、支援阎冯倒蒋的重要任务，虽未成功，但却是阎的宠信干将。宪兵副司令少将赵协中（五台人），参谋长上校徐应统，都是比其它兵种高一级军衔的。宪兵部队是阎政权反动统治的强大支柱。

宪兵司令除直属三营、九连千余官兵外，还有个侦缉队，设上尉队长李振武一名，他年近六旬，身材瘦高，阴险毒辣，枪法、武功都很好。右脸上斜着一条三寸长的伤疤，就是在捕人时被砍下的。他曾在清朝太原巡抚衙门当过班头，谙熟侦缉搜捕的各种技术。该人谈起“出红差”（砍头、枪决人暗语），有声有色。他常说清末民初有个刽子手叫锁牛则，如何跟师傅学砍人头的技法。“看刀口，推刀，踢尸……”。那时，一刀之罪，砍上两刀，尸主是不依的。李曾担任过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晋祠时的侍从副官，冯夫人李德全生下孩子时，他给找过奶妈。奶妈的条件是年轻体壮，讲北京语的。

侦缉队还设有中尉侦缉员两名，少尉侦缉员赵胡子一名。赵目不识丁，经常在执行了枪毙人的任务后，领到一元钱，沽酒痛饮，酣睡一天。侦缉队另外编制有上、中、下侦缉士兵十余名，都是从10多年的老宪兵中挑选出来的干练人员。他们当时除随时外出执勤外，一个任务是看守着扣押在三个窑洞里的六七名男女政治犯，另一个任务就是选一名中尉张侦缉员（名字不详）和一名侦缉中士，日夜守候在办事处值勤服务，侦察办事处的一切活动。

宪兵队和八路军办事处同驻小圪塔村，于是展开了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那时，办事处被宪兵队挤扎在小圪塔村最南边崖畔上的独户院中。该村原有居民30多户，人口百余。村子是在个簸

箕形的山洼里。农民们依山劈坡，挖掘了许多重重叠叠的土窑洞，这家的窑顶就是那家的院心。站在这家的院中，往往可以俯视下边人家的出工上地，人来人往。不论谁家的生活情况，彼此都可耳闻目睹，了如指掌。办事处居住的这个院落，四周都有宪兵队的参谋处、副官处居住，当然有形无形对办事处就是一个包围圈。

办事处所住的那户居民院中，仅有土窑四五孔，马棚三间，老乡和办事处各占窑洞两孔，马棚共同使用。生活起居，十分狭窄。可笑的是这个院中，还发生过“要命鬼”的一起风流韵事。据说该院住着个青年妇女，20多岁，姿色可人，窈窕出众，经常穿红戴绿，进进出出。从前阎军在此驻扎时，某兵与此妇女有染。后被人发现，该女子遂诬告其强奸她，处决了这个士兵，故得“要命鬼”诨号。办事处都是些青年人，处此是非之地，可知宪兵特务之用心，何其毒也。岂不知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早有“人民子弟兵”的美誉，出于污泥而不染，倒是暴露了宪兵队的丑恶用心。

宪兵司令部绞尽脑汁，监视办事处的一切活动。先是派了一名中尉侦缉员张××和一名中士侦缉班长，日夜守候在办事处值勤服务，美其名曰“负责安全”。实际是监视办事处的人来人往，言谈交际，搜集情报。如有人去办事处走过几次，他们就派人跟踪盯梢，调查追问。所以，这个院几乎成了禁区，很少有人敢去。即使是那家房东的亲戚来往，也不能放松登记。

宪兵队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了在房舍、院落监视外，对他们的人员外出行动，也要掌握。办事处的出入通道只有一条，出大门，爬上坡，经宪兵副官处、参谋处门前大道才能进出。宪兵队对办事处在小圪塔的活动，从室内到村落、到走道，都予以严密封锁。

办事处有一部无线电台，经常深夜发报收报。宪兵司令部也调来一部电台，赶走一户单间窑洞的居民，在距囚禁我们10余米

之处，秘密地安装起来。天线是从窗口中拉出来，沿土崖土墙，伸向窑顶上的酸枣树梢。主要是秘密收听或干扰办事处收发电报，破译电报内容。对宪兵队的这些卑鄙行动，办事处是早有预测与防备的。

宪兵司令部自认为将办事处的活动完全控制起来了，做到万无一失了。但是办事处的同志都是精明强干、智勇双全的。那时，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洪洞人，解放初期任山西省副省长）经常来往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并不常在机关。办事处只有曹立言（曹言行）秘书具体留守负责。他们这几个人，政治素质很高，又都是多面手；工作做得十分巧妙与有趣。

他们对宪兵队派来的两名监视人员，做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工作。首先对他们热情接待，敬之如宾。不仅不要他们操劳、服勤务，而且在生活上热情照顾。那时宪兵队的大灶伙食粗劣不堪，每天吃两顿黑面馍头，喝白开水，一点菜也没有，或者自备。而办事处人数少、单位小，生活搞得特别好。不仅是顿顿大米、白面，而且酒肉不断。那两个宪兵经常是饥肠辘辘，看到办事处的饭菜，莫不垂涎三尺。他们开始还假仁假义，开饭时间回到宪兵队大灶上吃饭。后来，彼此相处熟惯了，自然不再回避，叫吃就吃，叫喝就喝。那两个宪兵在那里经常吃得酒醉饭饱，熟睡如泥，自然就什么也顾不得了。每到逢年过节，办事处的酒肉饭菜更加丰盛。香肠腊肉，美酒佳肴，吃得那两个宪兵满嘴流油，赞不绝口。他们经常回来，告诉侦缉队的其他人员说：“虽然八路军的人员不关饷，但人家吃的喝的比咱李司令（润法）都好得多哩！李司令的小灶，只不过是炒山药蛋，蒸馍、面条，卫士给做了饭也不给吃一口；看人家官兵一样，同桌就餐，不分彼此，亲如家人。”

办事处的人员对那两个宪兵侦缉官兵，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他们，而且在政治思想上随时教他们阅读《新华日报》等抗战书刊。久而久之，启发了他们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逐渐

对八路军产生了同情感。对原来的监视任务，便成了应付差事，走走过场。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怎样在这个地区谋求半公开的随处活动和联系群众呢？

办事处饲养着骡、马、公驴各一头，这三头牲口，膘肥体壮、鞍辔新奇。骡子脖上系一颗小碗大的铜铃，红马颈上挂着一串杏核大的八音铃，公驴长得和骡子一样高大，系着像小孩拳头大的10颗铜铃，三头牲口走起路来，叮叮当当，远闻10里，好象一支乐队，悦耳动听。周围百十里方圆，所到之处，一见就知道是办事处的牲口。

办事处的工作奥妙就在这里。他们这三头牲口，由两名洪洞籍的粗壮青年赶着，或走在陕西省延安、洛川、宜川的道上，或穿行于山西省吉县、乡宁、汾西等地，隔三过五日的，到处来往。一方面，贩运些生活用品、文具纸张等，经营所得，补助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公杂费用、生活困难；另一方面，走村过社，打尖宿店，到处接触群众、联系工作。他们这支独特的交通队、三头牲口，系带着大铜铃和大串铃，震惊行人息脚相视。赶着这三头牲口可以无限制地随时随地收集材料，完成他们的交通任务。就我后来知道的赵某便是将重要情报材料，压在厕所石板下，由他们去收取的。这支交通队标志明显，便于识别；远近可闻，便于等候。办事处借助这支特殊讯号的交通队，到处活动，冲破了驻地宪兵的层层监视，撒开广大的情报网，在和宪兵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个胜利。

至于对被扣捕在侦缉队的男女六七名政治犯，办事处则尽力给予同情与支持，创造条件，把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转送给我们阅读，从政治思想上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我们这些政治犯，说穿了都是戴着“八路企图，叛军嫌疑”的帽子入狱的。自1939年“晋西事变”后，我们先后被长期囚禁在